

后浪出版公司

# 东亚史

(插图第4版)

(美) 罗兹·墨菲 著 林震 译

陈奉林 作序

# 東 亞 史 東 亞 史 East Asia

A New History, 4e

Rhoads Murphy

后浪·阅读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大学堂036

主编：李峰

副主编：张跃明 郭力 执行主编：吴兴元

# 东亚史

(插图第4版)

(美) 罗兹·墨菲 著 林震 译

陈奉林 作序

east Asia

后浪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史/(美)墨菲著;林震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6

(大学堂)

书名原文:East Asia:A New History

ISBN 978-7-5100-4711-4

I .①东… II .①墨…②林… III .①东亚—历史—研究 IV .①K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1556 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entitled EAST ASIA:A NEW HISTORY,4E, 9780321421418 by MURPHEY,RHOADS,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Inc,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 Copyright © 2007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TD.,an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Copyright © 2012.

For sal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sively(except Taiwan, Hong Kong SAR and Macau SAR).

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销售发行。

本书封面贴有 Pearson Education(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2409

## 东亚史(插图第4版)

著者: (美)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 译者: 林震

丛书名: 大学堂

策划出版: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吴兴元

责任编辑: 闻静 方理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长子营镇李家务村委会南 200 米 邮编 102615)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0261198)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9.5(黑白)+0.5(四色) 插页 4

字 数: 885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读者服务: read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服务: 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购书服务: 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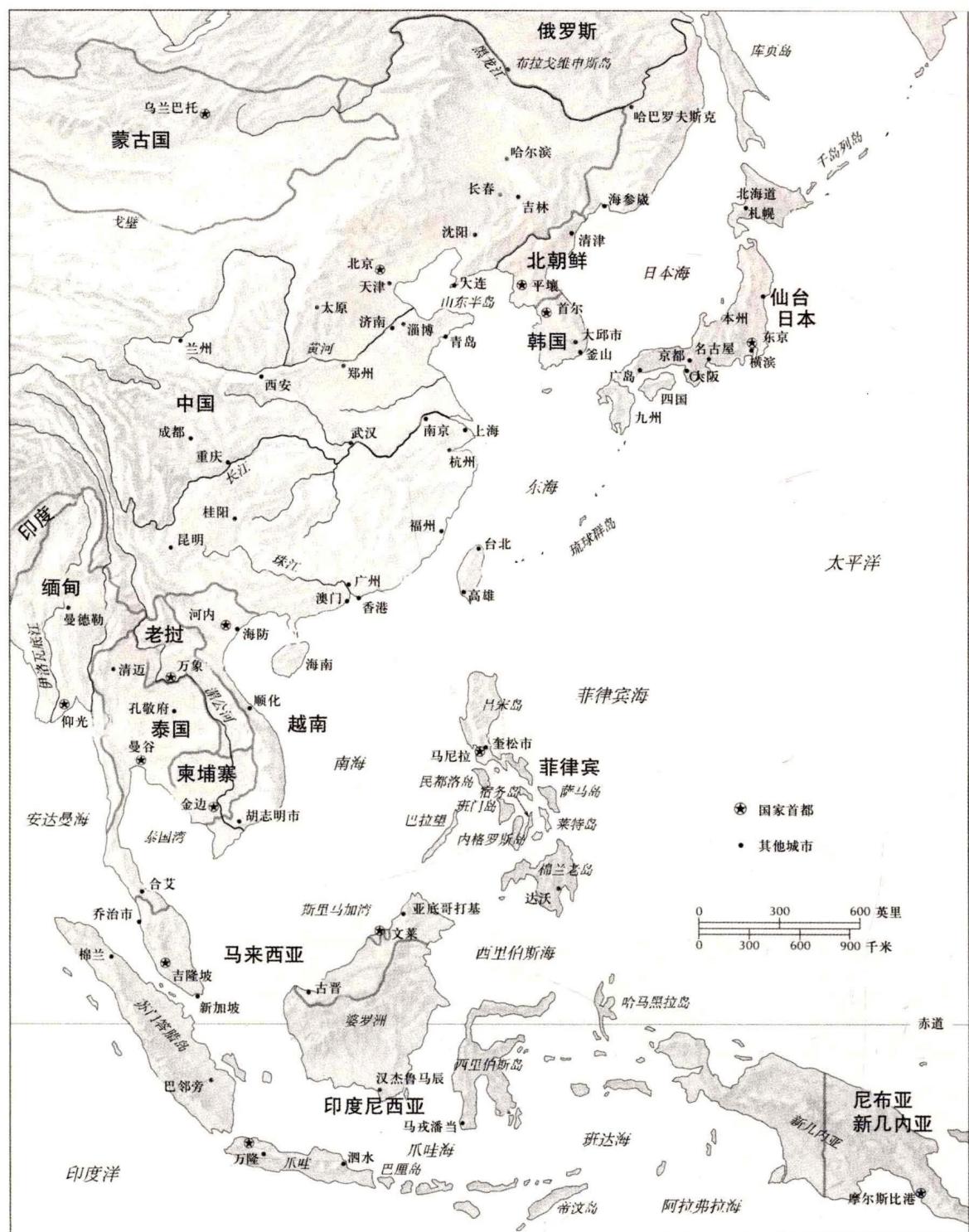
网上订购: www.hinabook.com (后浪官网)

ISBN 978-7-5100-4711-4

定 价: 8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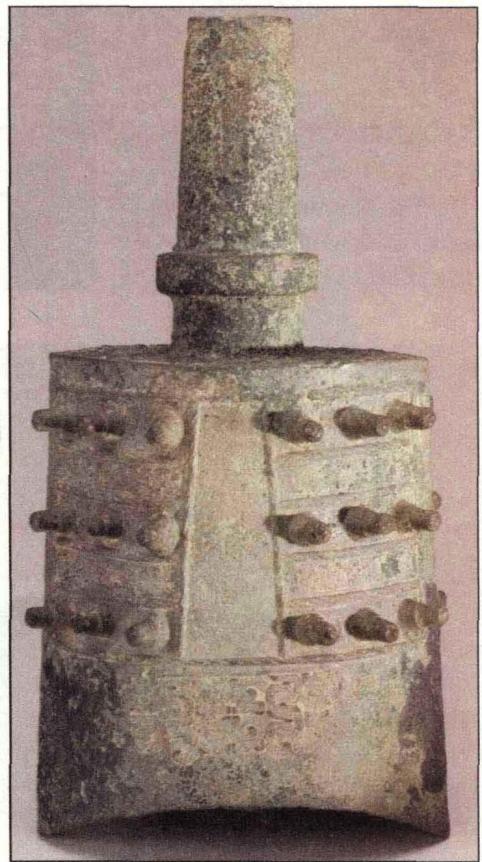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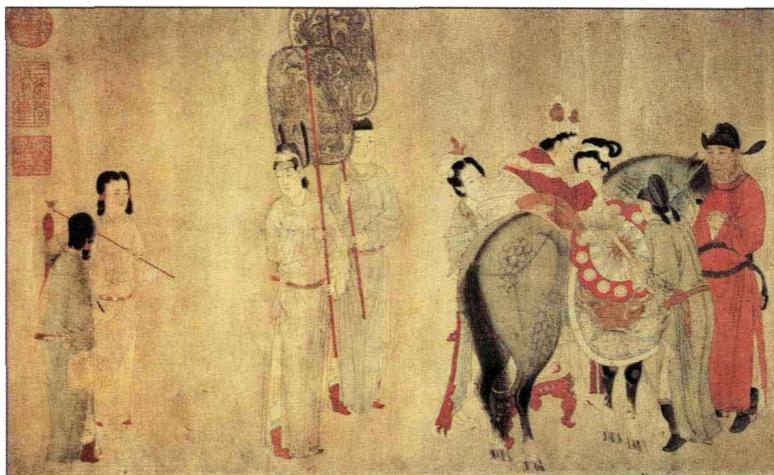
商人将马和战车一起葬入坟墓，供帝王在另一个世界使用。(Imagine China)



这个东汉铜鼓“托盘”再现了高超的商朝青铜艺术。托盘，中国东汉（25年—220年），着色陶器（未过火），1.59×38.10cm。（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issouri. Purchase: Nelson Trust, 34-218. Photography by Jamison Miller）



约公元前6世纪东周青铜编钟(6件)。每个编钟都会发出不同音符的声音。这种对应不同音符的编钟是周朝重要的乐器，并且还得到了生活在东周时期的孔子的赞赏。(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Washington D.C., Gift of Arthur M. Sackler, S1987.4)



贵妃上马图。太监举着精美的幡为她摇扇。请注意贵妃穿着的华美的皇妃专用服饰。(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F195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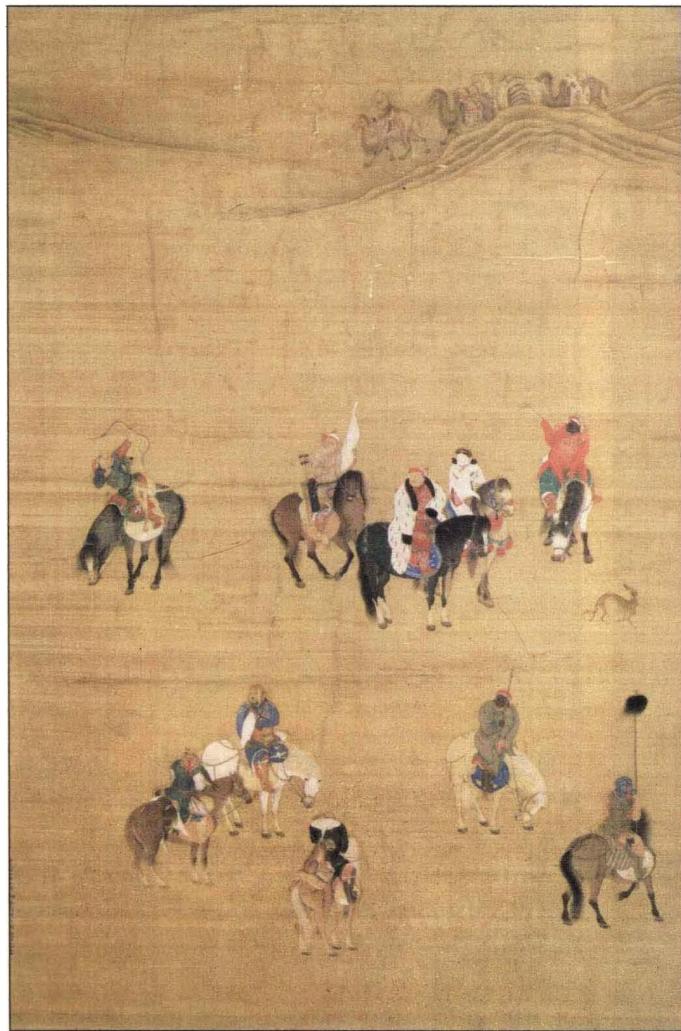
内人双陆图,周昉(约 730 年—约 800 年)。“双陆”是一种两人对弈的棋戏,玩者通过竹骰的点数来决定棋子的移动。图中右边的玩者正在投掷竹骰。这种棋戏流行于汉代,但这幅画为宋人摹本。(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Purchase, F1939.37)



公元 8 世纪早期(唐代)菩萨像的躯干,可能造于唐都长安。这尊菩萨像很明显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印度是佛教的起源地,中国僧侣前往印度取回佛经后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尊菩萨像的线条十分优美,臀部微翘,衣服上的褶皱清晰可见,这些都是受印度文化影响的表现。(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Gift of Charles Lang Freer, F1916.365)



正在娱乐的明朝皇帝的妃嫔：舞蹈、游戏、音乐和聊天。这些妃嫔基本上要在后宫中度过一生。(©Copyright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忽必烈汗在妻子(或者是妃子)的陪伴下出行打猎。据说,蒙古人无论男女,个个都是好骑手。这是一幅创作于13世纪末期的画作。元世祖出猎图,刘贯道,元朝。(The Palace Museum, Taipei,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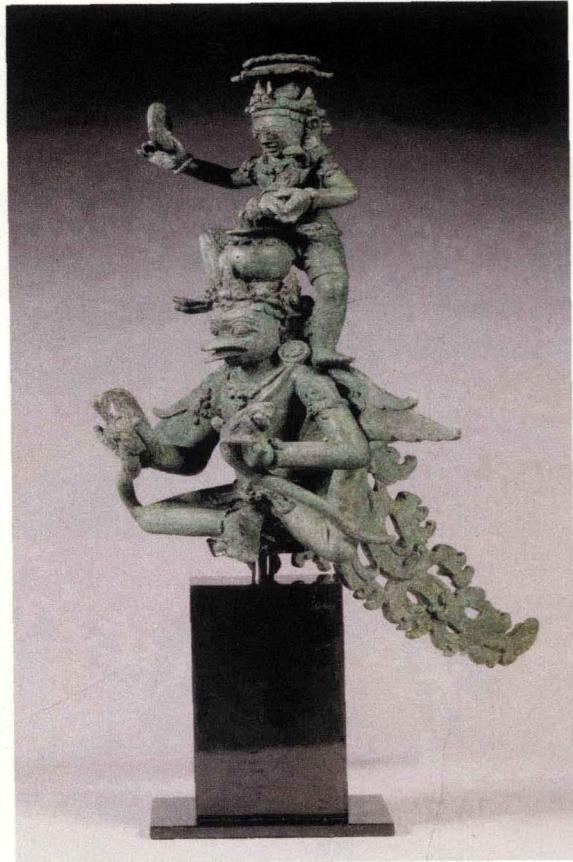
注意图中欧式风格的建筑结构。耶稣会士将这种欧式建筑引进中国后很快就广为流行。这是清朝果亲王弘瞻(1733年—1765年)的画像,绢本设色,画者姓名不详。(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Washington D.C., Purchase-Smithsonian Collections Acquisitions Program, and partial gift of Richard G. Pritzlaff, SI991.47)



新罗时期用金玉做成的王冠，这是新罗辉煌文化的象征，也象征着公元5世纪、6世纪以后统一的朝鲜国家。(Werner Forman/Art Resource, 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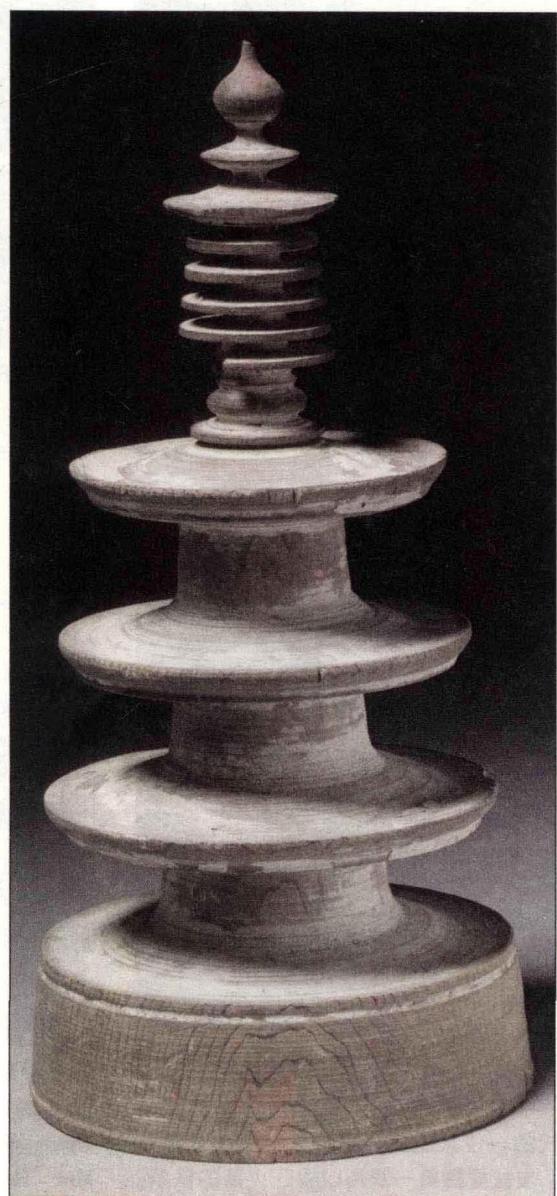
绿釉青瓷酒瓶，朝鲜高丽王朝，13世纪。瓶子上画的植物是人参。在历史上，朝鲜总是与人参这种据说能在寒冷天气增强人体活力的植物联系在一起。(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Gift of Charles Lang Freer, F1909.31)



印度克利须那神骑着“迦楼罗”(爪哇鹰神)。这尊铜像属于公元9世纪后半叶的爪哇。早在公元前1世纪，印度教和佛教就开始传入爪哇。(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urchase, Lita Annenberg Hazen Charitable Trust Gift, 1992 [1992.135] Photograph © 1992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公元 10 世纪初吴哥的三面“梵天”(印度教主神之一)石像，这是一尊高棉(柬埔寨的古称)风格的石像。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letcher Fund, 1936.  
[36.96.3] Photograph © 1986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奈良早期的迷你木塔，此时佛教刚刚传入日本。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Harry G.C.  
Packard Collection of Asian Art, Gift of Harry G.C.  
Packard, and Purchase, Fletcher, Rogers, Harris Bris-  
bane Dick, and Louis V. Bell Funds, Joseph Pulitzer  
Bequest, and The Anneberg Fund Inc. Gift, 1975  
[1975.268.150a,b]. Photograph © The Metropolitan Mu-  
seum of Art,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etropolitan Mu-  
seum of 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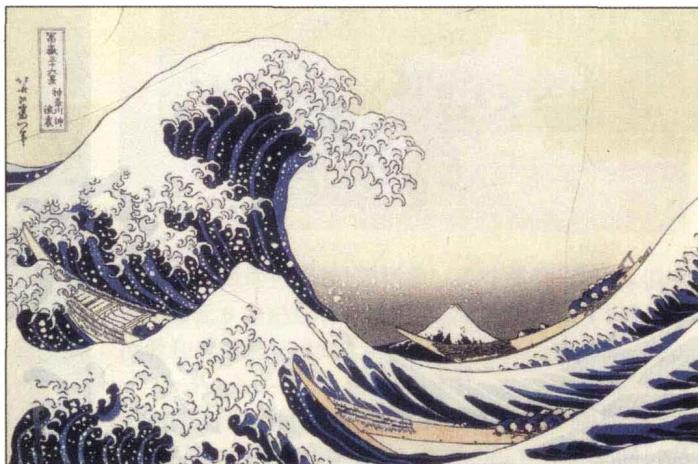
1853年，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抵达日本。请注意，背后就是让日本人惊慌失措并被迫向西方打开国门的“黑船”。(Courtesy of the US Naval Academy Museum)



这件19世纪中期的外套鲜艳夺目，是德川时期日本服饰文化的代表。当时日本城市（特别是江户、京都和大阪）的建筑绝大多数都是用木头建造的，因此火灾极为频繁，这种外套是与男性消防队员并肩工作的女性的工作服。这些女消防队员的穿着显然比男消防队员要鲜艳得多。(Courtesy of John. C. Weber Collection, photograph by John Bigelow Taylor)



明治时代的一位家庭主妇坐在火炭盆边读着一份广告，炭盆里搁着一双用以拨旺火苗的铁条。月冈芳年创作于1878年。(Asian Art & Archaeology ,Inc./CORB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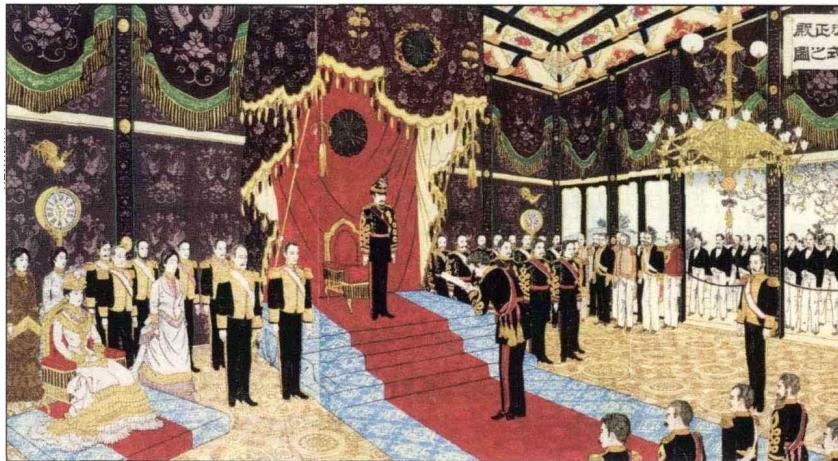


神奈川巨浪，葛饰北斋(1760年—1849年)。这张木版画被广为印制。背景是象征日本的富士山，在富士山的映衬和滔天巨浪之下是躲在脆弱的船舱中的不幸渔夫。《富岳三十六景之一·神奈川巨浪》，出版商：西村屋与八，1830年—1832年出版。(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O. Havemeyer Collection, Bequest of Mrs. H.O. Havemeyer, 1929 [JP1847]. Photograph © 199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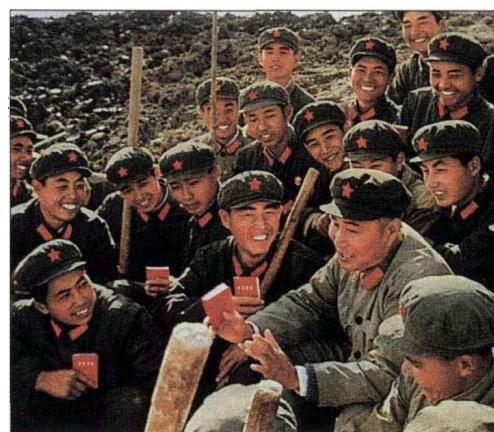


江户吉原“娱乐区”妓院的妓女，歌川丰国(1735年—1814年)创作于18世纪80年代初期。级别最高的艺伎坐在红地毯上,年轻的新手则坐在房间的角落。(© Copyright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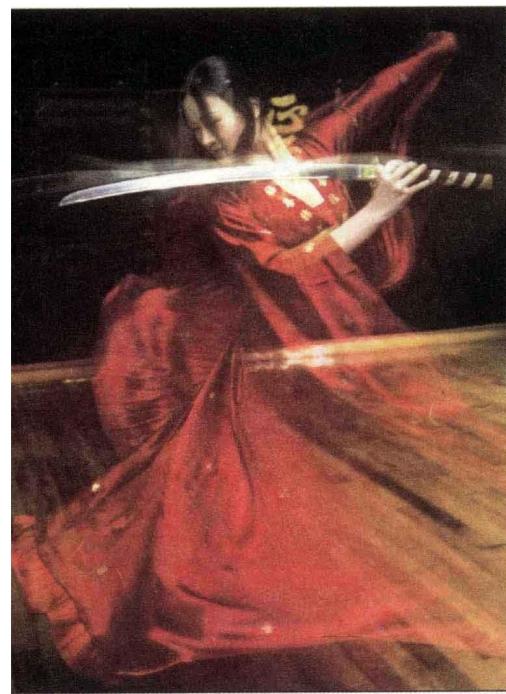
日本画家创作的天皇(图中站在华盖之下者)发布《明治宪法》图(《新皇居于正殿、宪法发布式之图,1889年3月14日》,安达吟光)。天皇左侧,皇后身着西式服装端坐在御座之上,皇后此举是为了促进日本引进更多的西方文化。(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ift of Lincoln Kirstein, 1959 [JP3233 – 3235]. Photograph © 1993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00年,八国联军取道天津一路攻进北京。联军解除了外国公使馆所遭到的围困,并且杀死了比被义和拳杀死的外国人要多得多的义和拳民。八国政府将足以压垮中国的巨额赔款强加给中国人后,慈禧太后才恢复了统治国家的权力。(akg-images)



人民解放军士兵正在聆听军官讲解“红宝书”。(R. Murph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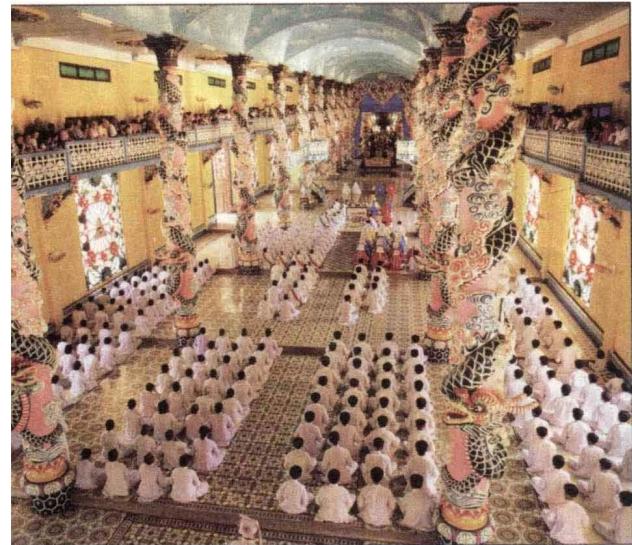


韩国剑舞。20世纪90年代，韩国女剑道大师尹姿京在首尔表演传统的“海东剑道”。

(Kim Kyung-Hoon/CORBIS)



位于当代日本的象征——现代东京闹市区中一座神道教神社的屋顶。  
(B.S.P.I/CORBIS)



信徒们在西宁(西贡西北80公里)的高台教参加日祷仪式。  
(José Fuste Raga/zefa/CORBIS)



北京,2003年10月15日。两位骑车的中国男士正在观看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的电视画面。  
(Guang Niu/Reuters/CORBIS)

## 序言 开拓东方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有几位对东方历史、特别是对东亚历史有精湛研究的学者,为社会贡献新篇,罗兹·墨菲无疑是其中之一。他同他的老师费正清一样,除了在亚洲史有建树外,也在东亚史方面有颇多贡献,他们共同推动了美国的东亚史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一流成就。在这里,我向国内读者介绍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撰写的一部鸿篇巨著《东亚史》,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阅读与理解上的方便。

国内读者对罗兹·墨菲并不陌生。1992年他出版了脍炙人口的《亚洲史》,受到中国读者的好评,成为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他因此在中国声名鹊起。《东亚史》是在原著《亚洲史》基础上的继续发挥和发展,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因为《东亚史》不仅增添了新材料、新事实,而且在分析的角度、取材范围以及分析与叙述的关系等方面与前者有许多不同,视其奠定罗兹·墨菲在东亚史独树一帜的学术地位并不为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兹·墨菲的《东亚史》足以与费正清、赖肖尔等人的《东亚文明:传统与变迁》相媲美,材料充实且有新理、观点材料纵横贯通,摒弃旧思维,尝试新方法,呈献新成果,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国际东亚史研究的水平与动向。平心而论,对于一位西方学者来说,撰写一部地域广袤、国家众多的区域通史,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想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罗兹·墨菲《东亚史》的亮点,也就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几个地方。作为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对东亚历史的观察是深刻的、准确的,提出了若干独具慧眼的见解,确立了对东亚史总的根本的看法。从时间上说,本书前后横跨5000年,将古代历史、文化、宗教、科技,重大的经济活动与人员往来,以及当前的妇女地位、城市问题、环境保护等统统摄于笔下,条分缕析,使读者看到东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他首先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科技予以关注,开宗明义地写道:“东亚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东亚还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鲜活的文明形态,它们丰富的文化发展史令人吃惊。”“中国的科学技术,如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燃煤、园艺学、冶金术和医学等,其发展早于西方,并对西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前言》)寥寥数语,将历史的长期沉淀说得分外清楚。作者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认识,他对东亚史的撰写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作者根据40多年教学经验撰写成这部洋洋洒洒的大部头著作,书中有着作者深思熟虑的理解与判断。墨菲认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有漫长而光辉的历史,直到18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观点显然是与西方的正统观点有所不同的。有的欧美学者认为,13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就已经很缓慢了,明清500年是中国历史的大停滞,或者说是整个东方社会的落伍时期。墨菲以具体的史实详细列举了近代以前中国的若干科学技术成就,这些成就包括公元

前几个世纪发明的铁掌犁、对太阳黑子的观测,以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燃料,活字印刷术、航海罗盘针的应用和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以及明清时期中国的医学、农学、水利与历法等等。这些科学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风貌。在墨菲看来,这些都是中国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是停滞不前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墨菲一扫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在东方历史研究上形而上学的阴霾,始终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待东方历史,因此我们看到的《东亚史》是一部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著作。他用大量的具体的实证材料来说明东亚历史的悠久性与连续性,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历史画面。这是努力开掘的地方,也是读者渴望了解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读过墨菲《东亚史》的读者都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知道,作为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东亚史》应该成为信史和良史,向读者提供真实无欺的材料,从历史材料中提取和发现对当今社会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以帮助人们恢复历史的记忆。也许有人不同意墨菲的一些观点,但读者不得不佩服他目光的犀利与深邃,明显地高出流辈。

关于中国唐宋文明,《东亚史》有许多惊人之语。我们看到作者视野之开阔,眼光之敏锐,昂扬着一代学者的锐意创新精神。作者看到自唐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倾向,各方面表现出博采异域、吞吐百家的恢宏气势,展现多姿多彩的大唐风采。对于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外国研究者都能看清的,也不是谁都能得出的结论。唐代无论在人口、领土还是在其他成就方面,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帝国缔造的辉煌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首都长安堪称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那里汇集了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城内居民多达 100 万,“长安城散发着世界大都市的熠熠光辉,其耀眼夺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第 115 页)城内各种宗教和睦相处,居民可以享受来自西域各国的体育、舞蹈、音乐和杂技,显然是典型的国际大都市的反映。

宋代的科技、文化与贸易是作者颇感兴趣的问题,是作者重点介绍的篇章。他视宋代为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因为它出现了科技与文化的普遍繁荣,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发展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记载,直接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与地区达 50 多个,有时候宋朝还利用使臣出使之机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宋代“贸易既盛,钱货遂涌涌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sup>①</sup>在造船方面,作者向读者提供的材料也是相当可观的,宋代的船舶可容纳 600 人,比前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船只都要大得多,由于指南针的应用,宋代的商船已经结束循岸航行的状态,克服“梯山重译”的重重困难,实现了从中国到南洋、印度洋以至非洲东岸的航行,对外贸易占到税收的五分之一,墨菲这样写道:“到了南宋,海外贸易的规模远远超过当时整个欧洲的外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宋朝时期,大型远洋货船上使用的各种航海技术已经臻于成熟。……宋、明时期,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和海洋大国。”(第 145 页)《东亚史》真是别开生面,令人振奋,表现出作者推陈出新的勇气和凌越前人的探索精神。由此观之,该著独辟蹊径,发掘枯竭隐深,摒弃了因循沿袭的墨守成说,在史学园地树起了一面旗帜。

<sup>①</sup>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 年,第 31 页。

在明清史研究上,《东亚史》以远见深识倾动人心。它没有像其他欧美学者那样,把明清 500 年历史看作是停滞与倒退,而是认为明代是中华帝国的新辉煌,在许多方面继续为世界做出贡献,“明朝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领域商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第 169 页),处于社会转型前夕。作者以一种少有的历史自觉把握了这种趋势。确实,明代是中国社会即将转型的时期,内有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空前地走向世界;外有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以科技为媒介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宗教与文化,使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受到冲击。中国的传统商品丝绸、茶叶、瓷器、书籍和漆器销售到日本、东南亚以至欧洲,国外市场为购买中国商品而支付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加速了国内商业化和货币化过程,对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十分有益。墨菲对明代中国社会工农业生产以及大众生活的描述十分详细,如文化和贸易蓬勃发展,商业和城市欣欣向荣,城市商人参与并推动精神文化的发展,城市居民有较多的精神生活等等,所有这些对于读者了解明代一目了然。

关于清代历史,作者以全球史的眼光加以审视,有助于清算历史上形成的对东亚史、尤其对中国史的偏见与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理性的分析视野对研究中国历史十分重要。通过研读我们看到,中国清代在整个世界历史坐标中的位置,既有成就也有不足,既有发展也有某种程度的徘徊,既有悠久的传统也有深沉的惰性,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细化生,形成社会发展的一定阻力,作者一语道破近代科学未能在传统技术发达的中国发生的深层原因:“中国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主要是那些建立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发现及其改良(如医学和药学方面),缺少那些经过系统、持续的科学研究之后取得的成就。”“中国工匠拥有娴熟的技术,擅长创造发明,但却很少从事理论和实验工作,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第 213 页)这个评断是作者通过深层考察所得,切中要害,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差距形成后来中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天然分野。

日本历史和朝鲜历史在本书中占据了相当的位置。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全面审视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看到它们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上的密切联系与互动。为了学习中国文化,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批外交使团,“到 8 世纪,派到中国的使团越来越大,大约五六百人分乘四艘海船,浩浩荡荡开向中国。……尽管要经历这么多的风险,日本人还是下定决心来到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将他们所能学到的或可以移植到日本的中国先进文化悉数带回日本。”(第 273 页)中国文化如滚滚洪流,加速了日本社会的变革过程,使其跟上了东亚社会前进的步伐。朝鲜的情况也是如此。从该书中可以看到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较之其他国家的密切情况。正因为这样,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以及朝鲜半岛鲜明的地缘政治特征。墨菲在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时,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即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主义影响问题,他认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是全世界殖民统治中最恶劣的。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给朝鲜民族留下痛苦、仇恨和愤慨的回忆,这种回忆在今天的朝鲜半岛仍然非常强烈。”(第 428 页)这种评断符合今天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没有半点夸张之意。

对东南亚历史与现实的热情关注也是《东亚史》的重要篇章。作者高度评价了东南亚的悠久历史以及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尤其关于东南亚各国摆脱殖民主义枷锁、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分析较为客观。看得出作者是以极大的热情来撰写这部著作的。作者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东南亚在战后完成了非殖民化进程,开始探索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东南亚各国在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作用将会上升,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给予东南亚足够的重视。

《东亚史》关注现实的东南亚并非应一时之需,而是作者自觉地参与到了战后东亚和东南亚有史以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中,适应世界形势的需要,发挥了理论先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罗兹·墨菲继承了其老师费正清等人的志业,又在许多方面有新的认识,承担了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他一方面努力去唤醒和复活过去的历史,同时也按时代要求去理解和书写历史,对东南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给予更多的关注,做到了史学常写常新。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告诉读者,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东亚将会逐渐主宰这个世纪。

以上是《东亚史》的大体轮廓,也是书中引人入胜的地方。但是书中有些观点也是与我们大相径庭的,甚至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作者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朝代的循环史,忽视了社会经过生生不已、后代否定前朝后产生的新内容,任何一个朝代的产生都不可能重复前一个朝代的历史,历史在螺旋式升进中的相似表层下有着不同的内涵,永远不会重演。以“王朝循环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是西方流行的一个观点,反映的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他把20世纪中国的伟大革命看作历史上的中国农民运动;还有,作者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改革前的政策完全对立起来,这恐怕也是有问题的。作为学术研究,同时又是西方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我们看到,他对东亚的历史与人民怀有炙热的感情,叙事时尽可能地做到了公正与客观,较好地解决了史书的体系问题,避免了结构松散与材料堆积,尽量处理好分析与叙述的关系,材料与观点的关系,显示出作者乐观向上、生动活泼的探索精神。总之,不管读者出于何种目的来阅读这部著作,都会从事受到启发,收获教益。

陈奉林

2012年4月于外交学院

## 前　言

东亚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包括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和若干文化相近的东南亚国家。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 25%，是欧洲全部人口的两倍还多，是美国人口的数倍。大约 1850 年前，东亚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比例更高。东亚还拥有全世界最古老、鲜活的文明形态，丰富的文化发展史令人吃惊。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较易理解的文化单元，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模式扩展到临近的朝鲜和越南，稍后扩及日本；在这三个国家，中华文明的痕迹至今仍然很明显。因此，东亚有时也被称为“中华世界”。现代东亚地区的发展包括各个政治、文化上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密切互动，比如，1895 年（或 1910 年）以后日本对朝鲜的占领，1931 年（或 1937 年）至 1945 年发生的漫长的中日战争，以及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传播到朝鲜和越南。战后，日本在快速的经济和工业增长方面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方面，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和韩国则居于全球前列。

东亚因其特别漫长的历史而显得十分重要。这种历史本身也是极有意义的，提供了审视我们自身、我们所拥有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我们自己的时代非常宝贵的观察视角。东亚文明比西方的任何文明都要古老，提供了一整套解决人类普遍问题的独特的、令人着迷的答案。东亚的现代发展也是如此。东亚诸社会找到了解决现代问题的独特方法。在许多方面，这些方法和我们西方社会所采取的解决令人头疼的问题的方法（或者是束手无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应该向东亚学习，以改善我们自身的状况。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的科学技术，如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燃煤、园艺学、冶金术和医学等发展远早于西方，并对西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艺术和稍后的日本艺术，是十八九世纪欧洲效仿的对象。在 19 世纪西方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与中国、日本的贸易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天，我们的财富和东亚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密切。

本书介绍了古往今来东亚这个世界主要部分的历史。本书主要被用作东亚课程的教材。读者可以从附于每章之后的参考资料或其他重要资料（除了正文所引用的文献之外）中，获得进一步阅读的文献或网络资源的相关信息。各章长度大致相等。本书可单独用于（或加上一些教参）一学期或一学年的课程。作者根据四十多年教学经验撰写了本书。忆昔当年，作者有幸作为费正清和赖肖尔的助教涉足东亚研究，此书的完成也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费正清、赖肖尔两位先生是东亚研究的拓荒者，他们合作撰写了东亚研究的系列基本教材：《东亚：大传统》（1958 年）、《东亚：现代变迁》（1965 年）和一卷本的《东亚：传统和变迁》（最新版本是 1989 年）。1961 年赖肖尔被任命为驻日大使，有关现代日本部分的撰写任务遂交给艾伯特·克雷格 [Albert Craig]）。三位先生以哈佛大学为起点，建立了非常成功的东亚课程。